

# 舆论传播与五四学生运动

——以五四时期《京报》为中心

王 康

**摘要:**报刊是社会舆论的重要载体,不仅可以反映舆论,而且能够引导、组织、制造舆论,形成强大的舆论风潮,进而影响社会群体的思想和行动。五四时期的青年学生群体既富热忱和变革理想,又具有新知,他们最先与舆论媒介结合,唤醒国民,成为民众运动的先导。《京报》创办者邵飘萍与学生群体的交往,造成“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舆论得以在更大范围内传播。舆论引燃了青年学生的爱国情绪,同时又推动了五四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舆论;五四运动;《京报》;邵飘萍;报刊史;新闻史;近代报刊

**中图分类号:**K261.1;G2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1)02-0137-06

**作者简介:**王康,辽宁大连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五四前后,报刊引导社会舆论的功能日益彰显。一方面,政治派系利用报刊互相攻讦;另一方面,报刊舆论的传播与学生运动紧密结合,成为民国初期各种风潮中不可忽视的力量。言论自由和新闻独立本是舆论远播的前提,而民国初年的北京报界,大小 70 余家报纸中比较重要的有 35 种,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有政治背景。民国报人邵飘萍对北京报业及报人沦为政治附庸的舆论生态状况颇为不满,认为报纸新闻应该独立于政党之外,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样才可以在报道中不受挟持,正确地反映舆情和引导民众。1918 年 10 月 5 日,邵飘萍创办《京报》(对开四版日报)并兼任主笔。《京报》的定位是“供改良我国新闻事业之试验,为社会发表意见之机关”<sup>①</sup>,为民众创造一个舆论阵地,并借此号召国民联合起来与政府抗争。

## 一、唤醒国民:《京报》与《国民》杂志

五四时期,青年学生纷纷成立社团、创办杂志,对政治、文化、经济等社会问题进行讨论,力

求在国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以尽唤醒国民之责,成为民众运动的先导。

国民杂志社是五四时期比较有影响的社团,其成员以北大学生为主体,主要有邓中夏、黄日葵、高尚德(君宇)、陈宝鏊(剑修)、陈钟凡、马骏、许德珩、张国焘、段锡朋、孟寿春、易克嶷等,成员曾发展到 200 多人,大多数人参与并领导了五四游行示威活动。国民杂志社的舆论阵地《国民》是全国性刊物,自 1918 年 10 月创立起,即与《京报》关系密切。《国民》的宗旨是“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新知识,研究学术,提倡国货”。该宗旨得到《京报》报人的赞成,主笔邵飘萍认为,“国民杂志社创刊的四大宗旨,正合鄙怀,至深钦仰。所望认定宗旨,始终不移”<sup>②</sup>。他强调,中国最缺少国民之学术思想,国民对于学术上无所表示。而在日本,不仅杂志多,并且研究详细。办杂志可以传国民之心理,很值得提倡。而国民杂志社的创立,可以启蒙国民对于学术的研究。

作为启蒙国民的中介,《京报》与《国民》有

<sup>①</sup> 《京报三年来之回顾》,《京报》1922 年 10 月 10 日。

<sup>②</sup> 《邵振青致记者》,《国民》1 卷 1 期,1919 年 1 月。又见张允侯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年,第 29 页。

共同的主张与关怀,均欲唤醒国民,提倡“国民自觉”。邵飘萍在致国民杂志社记者的信中表示:“弟平时在言论界之所主张,每以为欲救中国,其根本在国民之自觉。国民自觉,则无赖军人、下等政客,凡足为国家进步障碍者,自然归于淘汰。盖世界各国断无有国民毫无能力而国家有振兴之希望者。此种议论,弟在京沪报纸评论、通信栏内,遇有机会辄发表其大略。今后仍抱此旨,以尽提倡之责;纵为权贵官僚所不喜,职务所在,不敢辞也。”<sup>①</sup>正如《京报》创刊词所言:“时局纷乱极点,乃国民毫无实力之故耳。……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为也。”<sup>②</sup>《京报》在实现新闻独立的基础上表达民意,促进国民自觉,提倡国货。而国民杂志社强调国民独立性,意欲通过普及知识塑造国民性,在政治运动方面亦提倡国货。二者旨趣极为相似。五四运动期间,《京报》积极声援《国民》,刊载了大量关于提倡国货、号召国民自觉的要闻报道,如《国民与山东问题》、《国民对待外交之准备》、《国民与国内时局》、《速制国货,快用国货》、《挂洋旗之国货与挂国旗之洋货——提倡国货问题之研究》<sup>③</sup>等评论,以及《提倡国货之消息》、《各方面提倡国货》、《各省之提倡国货》、《各方面之提倡国货》<sup>④</sup>等文,意在配合学生运动,进行舆论策应。

学生群体与职业群体不同,他们没有完全进入社会群体的利益网络中,同时学生掌握的资源有限,自身力量略显薄弱,所以学生群体的活动必然依赖于校外社会人士的支持。国民杂志社也不例外。邵飘萍本人兼有多重社会身份且长于社会交际,他的积极参与更有益于国民杂志社与社会各界的联系。在致国民杂志社记者的信中,邵飘萍许诺“需助之处,惟力是视”<sup>⑤</sup>。同时,他也被国民杂志社聘为顾问,经常参加国民杂志社活动,并与社员保持书信往

来<sup>⑥</sup>。《国民》每期辟有国内外大事栏目,介绍国际新闻,但因为是学生期刊,消息总不如《京报》来得快、来得全。因此,《国民》发表的时事评论大多参考了《京报》的报道,《京报》的舆论报道能够在北大学生中传播,与《国民》的“宣传”密不可分,而《京报》的舆论影响力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青年学生的思想和行为。

## 二、邵飘萍与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

《京报》在学生群体中的影响力也体现在学生们对报纸的“追捧”阅读上。《京报》头版时评着重报道和评述国内外政局和战事,多为邵飘萍撰写,其文章笔调酷似梁启超,极富煽动力,很吸引学生们模仿<sup>⑦</sup>,因此《京报》成为青年学生争相阅读的对象。报纸问世一月,销量就从300余份陡增至4000份。很多学校阅报室订有《京报》,个人订阅以及互相传阅的学生也不在少数。此外,邵飘萍力倡学生建立新闻学研究社团——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第一次吸引共同关注舆论传播、兴趣相同的学生们聚集在一起,相对集中和系统学习新闻传播知识,共同切磋,互相辩驳。邵飘萍亲自指导会员新闻实践和新闻学研究,自被蔡元培校长函聘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导师之后,每周讲授两小时新闻评论和新闻记者外交术两门课程。他以自己多年从事采访活动的经验、体会和办报实践中的问题为主要内容,讲得深入浅出,生动实际,给人启发。在以课堂讲授为主的交流平台上,他既是讲师,又是学生舆论的引导者。新闻学研究会的会员都对邵飘萍怀有好感。毛泽东曾感慨邵飘萍作为新闻学会的讲师,对他帮助很大<sup>⑧</sup>。会员罗章龙认为:“邵振青对新闻学有抱负,慨然欲为中国新闻界别开生面……他文采丰富,议论通畅,思想敏捷,真是下笔千

① 《邵振青致记者》,《国民》1卷1期,1919年1月。又见张允侯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29页。

② 《本报因何而出世》,《京报》1918年10月5日。

③ 这5篇评论分别载《京报》1919年4月28日、5月3日、5月17日、5月26日、6月5日。

④ 这4篇文章分别载《京报》1919年5月26日、5月27日、5月31日、6月1日。

⑤ 《邵振青致记者》,《国民》1卷1期,1919年1月。又见张允侯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29页。

⑥ 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载《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5页。

⑦ 徐铸成:《报海旧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6页。

⑧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127页。

言，顷刻交卷，就在这方面给我们的训练很大。”<sup>①</sup>新闻专业训练和深厚的师生情谊，奠定了五四学生运动舆论策应的基础。许德珩回忆，邵飘萍在五四前一段时间，每星期日来讲他的新闻采访经验，新闻研究会与五四运动很有关系<sup>②</sup>。新闻学研究会培养会员有百余人<sup>③</sup>，其中不少会员后来成为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如高尚德是五四运动的中心人物和北大的学生代表，杨兴栋是在五四当天第一批冲进曹汝霖住宅的学生之一<sup>④</sup>。还有人后来加入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国共产党和劳动组合书记部，参加亢慕义斋各项革命活动，或为民权运动大同盟成员，“均曾积极参加五四运动的直接行动与新文化革命运动”<sup>⑤</sup>。

除了课堂讲授，邵飘萍还指导学生编辑出版自己的社团刊物《新闻周刊》。其目的是“便会员之联系，便新闻学识之传播，便同志之商榷”，主要将一周的新闻进行记载，发表公允的评论。为了扩大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社会影响，《京报》馆用自己的舆论平台做宣传，刊登其征求会员的广告<sup>⑥</sup>，并鼎力支持《新闻周刊》的出版发行。1919年4月30日，《京报》第一版刊登带有《新闻周刊》刊头的图文广告<sup>⑦</sup>，并一直持续刊登至6月4日。即便五四运动期间，《京报》版面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也没有停止在第一版刊登《新闻周刊》广告。《京报》馆也经常向北大同学组稿，不仅缓解《京报》初创时人力不足的压力，还为同学们提供了新闻实践的机会。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是“报业教育之发端”，成为推动中国现代新闻学发展的重要媒介。这时，新闻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已被纳

入现代学校教育范围。1918年10月，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成立，以“灌输新闻知识，培养新闻人才”为宗旨。次年2月易名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名号增加一个“学”字，其宗旨也改为“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sup>⑧</sup>。我们可以看出现代新闻学学术化、学科化的态势。邵飘萍从倡议到担任讲师功不可没，其讲稿于1923年结集出版，即《实际应用新闻学》，是第一部研究新闻采访工作的专著。新闻学的学科化使学生群体在接受新闻训练的过程中，不仅靠感觉和经验来理解舆论，还要从新闻学理上认识舆论，熟谙舆论运作、传播的方式，更有利于学生主体以舆论为武器，反对北洋政府、申述自己的言论主张、批判封建思想文化。可以说，新闻学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为日益高涨的五四学生运动做了铺垫。

### 三、运动学生：“外交失败”舆论的传播

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导致五四学生运动的爆发。巴黎和会外交的消息传递，在国内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经由报刊表述<sup>⑨</sup>、舆情渲染，国内知识界及青年学生获悉“外交失败”消息后极为震惊愤慨。先前舆论界对巴黎和会普遍的乐观态度与后来的激烈情绪形成鲜明对比。北京的青年学生被动员起来，一场大规模的舆论风暴开始形成。那么，“外交失败”舆论是如何传播至北京学生界并引发了五四运动？

1919年4月22日，巴黎和会上五国会议继续讨论山东问题，由于中日换文的公布，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态度遂发生变化，认为经日本交

① 罗章龙：《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与邵振青》，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新闻研究资料》第四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122页。

② 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载《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第11页。

③ 旭文：《邵飘萍传略》，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4页。

④ 陆彬良：《我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始末》，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新闻研究资料》第四辑，第124页。

⑤ 罗章龙：《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与邵振青》，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新闻研究资料》第四辑，第120页。

⑥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招收会员启事》，《京报》1919年1月5日。

⑦ 广告称《新闻周刊》“乃中国唯一传播新闻学识之报；对于一周新闻为系统之记载，下公允之评论”，并介绍该刊每星期日出一张，售铜元二枚，外寄另加邮票半分。发行处为北京大学日刊编辑处。零售处为北京大学号房及派报人。

⑧ 《新闻研究会改组纪事：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简章》，《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4日。

⑨ 5月1日，上海的《大陆报》报道了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由于地处上海且为英文报纸，北京学生界、知识界受其影响的程度囿于资料尚难以确定。

换山东的归还方式是符合法律程序的。4月24日,梁启超得知这一消息,立即从巴黎致电汪大燮和林长民转国民外交协会,内称:“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sup>①</sup>梁启超虽对政府外交政策存有异议甚至不满,但并未在电报中发表任何关于政府外交的评论,只希望借助国内舆论的力量促使外交上的成功。

5月1日,遥在北京的林长民接到了梁启超电文。5月2日,林长民在《晨报》头版“代论”栏发表《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一文,指出“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国亡无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林长民这篇文章被后人视为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索<sup>②</sup>。5月3日,蔡元培从汪大燮、叶景莘处得知消息,当晚召见北京学生代表,告知“钱能训内阁密电巴黎和会代表签字于丧权辱国之山东条款”<sup>③</sup>。

有学者认为,把山东问题与济顺、高徐两路联系起来,国内舆论界把外交失败都归咎于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诸人,是受了林长民、梁启超等人的宣传鼓动。但我们纵观整个消息的传递过程,无论是梁启超还是林长民、蔡元培等人没有直接指称巴黎和会为“外交失败”,他们更强调外交形势的紧迫性,以期利用国内舆论压力扭转外交不利局面。然而,五四当天,学生向民众散发的宣传单上却赫然印着“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外交失败的表述和舆论传播与《京报》及其主笔邵飘萍不无关联。

5月3日晚7时,北大部分学生在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举行临时会议。参加人数达一千

多人,多是北大学生。国立高等师范学校、法政专门学校和工业专门学校等也派有代表。邵飘萍到会并发表演讲。集会通过决议号召北京大专学校的所有学生于5月4日举行群众集会、抗议政府的外交政策<sup>④</sup>。据新潮社罗家伦回忆,邵飘萍在5月3日晚到北大来报告说山东问题失败。又有材料记载,邵飘萍在集会上演讲中国外交失败的经过和原因:“现在民族危机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挽救而只有沦亡了。北大是最高学府,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学生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sup>⑤</sup>龚振黄在《青岛潮》中写道:“先请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邵君报告和会中山东问题之经过,及现下之形势。”<sup>⑥</sup>时为学生的杨亮功也有回忆:“大会开会之后,先由北大‘新闻学术研究会’讲师邵飘萍分析山东问题;接着是其他同学的演说。”<sup>⑦</sup>傅乐成《傅孟真先生与五四运动》一文称:“当晚某记者邵飘萍也参加此会,并登台演讲,措辞极其沉痛激昂。”<sup>⑧</sup>

邵飘萍在演说时“激昂慷慨,声泪俱下”,仿佛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外交谈判失败的画面就在听众面前。这场演说感染、影响了会场气氛,给学生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鼓舞感,“法科学生谢绍敏悲情填膺,当场将中指咬破,裂断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字,揭之于众,而鼓掌声、万岁声相继而起,全场顿现一种凄凉悲壮之气象”<sup>⑨</sup>。第二天,这些人绝大部分参加了五四游行示威。学生们通过邵飘萍的演讲了解山东问题的来龙去脉,同时,邵对山东问题的主张也影响了在场的学生,演讲者的意见已经转化为全体学生的认知。

“外交失败”的表述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学生对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处境的认知。青年学生

①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80页。

② 张朋园:《梁启超与五四运动》,见汪荣祖编《五四研究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第280页。

③ 叶景莘:《“五四运动”何以爆发于民八之五月四日》,《大公报》1948年5月4日。

④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5页。

⑤ 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学生运动史》,北京:北京出版社,1979年,第20页。

⑥ 龚振黄:《青岛潮》,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资料》,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39页。

⑦ 杨亮功:《五四一甲子》,《联合报》(台北)1979年5月5日。

⑧ 傅乐成:《傅孟真先生与五四运动》,汪荣祖编《五四研究论文集》,第270页。

⑨ 蔡晓舟、杨景工:《五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五四爱国运动》(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453页。

对事态发展的判断容易受情绪、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会采取较为激烈的方式向世人表达群体自身的声音。当时学生们认为，政府外交已无路可走、无计可施，导致国家与民族危在旦夕，拯救民族危亡唯有依靠国民。于是，青年学子们通过示威游行方式先自觉尽其国民之责，以此向北洋政府和国际社会施压，促使更多的“国民”觉悟。学生群体组织起来相对简单，而且青年学生在激动的情绪和迫切的心情驱使下行动十分迅速，虽然筹备示威游行的过程仓促，但其声势和人数却造成广泛的影响。

“外交失败”的说法在学生示威游行时得到更大范围的传布，造成了强大的民众舆论声势。5月4日下午1时，北京学生3000余人从四面八方汇集天安门，进行了短暂的集会演说。北大学生、新潮社负责人罗家伦发表了五四运动宣言，全文由白话文写成，开篇直指“外交失败”一事：“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sup>①</sup>该宣言被油印在学生游行时散发的传单上。传单也具有广泛、迅速的鼓动力量，通过人际接力式的多向延续传播，这份用号召性、鼓动性的语言书写的传单，读者数量是成百上千人。“外交失败”的舆论传播已超出学生界，漫向民众。北京民众在传单内容的影响下形成共同认识：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已经失败。

#### 四、《京报》言论与学生运动

《京报》作为在北京地区发行的以独立言论著称的私营大报，对5月4日的学生游行事件反应迅速，5月5日在要闻版头条位置刊载了邵飘萍的时评。文章赫然以《外交失败第一幕——群众之怒，政府之羞，东亚未来之危机，中日国交之不幸》为题：

昨晚东京来电，欧和会中之我国山东问题，已依日本主张而解决。日人所传未必可信，即有其事，我国代表当不至于签字。如果签字，则国内将有弥天之风潮，此吾人在职务上不得不预告政府者。

昨日各校学生因游街大会而有曹宅之

巨祸。学生之于是役者达数千人，多与曹某无一面之识，然则固非由于私仇宿怨也。凡社会上大骚动之原因，在群众心理上言之，殆有一种不可思议之狂热。此种狂热发动之点，每出于天良，而行为所届，殆非法律范围所可制限。故群众之肇祸与个人之故意犯罪大异其趣。此当局所宜注意。何以使群众陷于如此狂热之状态，宁非政府所当引咎自责者乎？换言之，外交苟不自困于绝地，何至使群众激成如此之狂热乎。

……故山东问题万一果如东报所传之结果，吾人不能不问政府何以竟食坚持到底之前言。同时吾更为东亚危，为中日国交危。中国可悲，日本亦决非可喜之事也。

文章标题使用大号字体突出显示了“外交失败第一幕”。“外交失败”四个字，意将政府外交处境展现在读者面前；而“第一幕”实则暗示失败仅仅是开始，若民众无所动，外交还将出现更大的失败，国家命运危在旦夕。时评从外交失败这一事件说开去，立足于整个国家的存亡，认为政府外交应“引咎自责”，肯定了青年学生们表现出的责任感。文章把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民族危亡、国民觉悟、学生游行示威等事件联系起来，颇具说服力和感染力，读者很容易同情学生的游行举动，并表明学生运动的合理性。该时评延续了邵飘萍一贯的文章风格，措辞严厉，说理鲜明有力，引起了读者的思考与共鸣。

《京报》对于学生游行的肯定态度，在北京报界起到了动员作用。次日，《晨报》评论开篇首句也采用了“外交失败”的表述。外交危局下，报人群体此举有因应时局的意味，同时也起到了扩大本报影响的效力。几家相对审慎的报纸，如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天津的《大公报》、北京的《益世报》也以大量的篇幅、大字标题及时报道了学生运动，并发表评论。总的看来，《京报》时评的措辞最为严厉。

5月5日，“外交失败”表述见诸《京报》。6日，“外交失败”的说法亦见诸《晨报》。有意思的是，几天后的《京报》和《晨报》分别发表“购回五月五日、六日本报”的启事。5月6日，

<sup>①</sup> 《北京全体学界通告》，《京报》1919年5月5日。

《京报》在新闻版头条位置发布《本馆启事》,标题为《收买昨日本报》:“昨日(五月五日)所出版之本报,因阅者骤增,不及添印,致外埠尚未有寄出者。倘有人愿以昨天本报出卖,本馆当酬还原价。此启。”5月7日,《京报》继续发布启事<sup>①</sup>。5月10日,第三次发布启事,“购求五月五日所出版之本报,每份价洋一角,以十五份为限”<sup>②</sup>。5月8日,《晨报》发表启事《购回两日本报》:“本月五日、六日两天,本报因销数骤增,不及加印,致应寄外埠之报,顿形不足,阅者诸君如能以该两日之报出卖本馆,愿照原价购回。”报馆以原价甚至高价收回已售出报纸实属少见,何以五四运动之后,北京报界会出现这种一报难求的热销局面呢?五四事件中学生群体固然扮演着社会政治运动的先锋角色,然而,若不能得到社会舆论的声援,便难以持久并取得胜利。报纸刊载学生运动的整个状况,为其争取了广泛的舆论支持。我们必须看到,这一时期青年学生的主体意识虽然已经形成,但社会意义上的独立性尚有待完善,学生群体在试图唤醒国民的过程中,必然需要越出学生界而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响应,而报纸的舆论恰恰可以实现这种“界”的突破,学生有赖于舆论以求得其他社会群体的支持,反过来报纸也需借助学生事件扩大其自身的声名,并在舆论风潮中凸显其社会影响力。民众通过读报来了解和认识刚刚发生的社会事件,同时,报纸在五四期间所表现出的影响力也促使政治精英开始重新审视报纸舆论的功能。如孙中山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后受到启发,在给国民党海外同志的信中说,“(五四运动)推原其始,不过由于出版界

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大放异彩,学潮弥漫全国”<sup>③</sup>。

五四学生运动由于舆论界的介入,不仅取得了“不签字”的胜利,并且对北洋政府形成较大威胁。1919年8月,北洋政府查封了《京报》,又相继封禁《每周评论》、《国民公报》、《公言报》等报纸,意欲彻底整肃北京舆论界。先是示威学生,再是舆论媒体,都没有逃脱北洋政府的武力压制。

综上所述,报人与学生同为近代中国新兴的社会势力,二者在参与社会政治运动中互相支持、声援。报纸广泛传播使五四事件的影响扩大成为可能,这不仅表现在五四前夕《京报》对巴黎和会外交状况的报道与关注,也表现在五四前夜邵飘萍对学生的演讲,报纸一定程度上引导学生群体的话语表达和行事逻辑,学生群体中鼓动者以其阅读报纸所获得的信息和词语分析着事态的发展,并有力地充当了报纸舆论的进一步传播者。我们暂不去讨论报纸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但至少学生们充分地相信了这种报道的“事实”,而且受到了这种“事实”潜移默化的影响,迅速行动起来,向政府示威,力求“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当学生被政府逮捕后,《京报》及报界同仁们迅速表达支持学生的立场,极力为学生的行为辩护,舆论界对学生的“激进”举动表示了理解和同情。新闻媒介促成学生的示威事件演变成一场民众广泛参与的运动。从五四前后舆论界的表现来看,《京报》是五四学生运动最有效的推动者。

责任编辑:张朝胜

① 《收买前日本报》,《京报》1919年5月7日。

② 当时《京报》售价为每月洋六角,参见《本馆启事》,《京报》1919年5月10日。

③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09页。